杰出的外交家——周恩来

王世德

在举国迎庆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各族人民缅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丰功伟绩的时候,我作为开国总理周恩来故乡的一名普通公民,常想起他老人家紧跟伟大领袖毛泽东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的巨大贡献,奉献的毕生精力。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以外交领域为阵地,挫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粉碎了妄想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的企图。在周恩来总理分管外交工作的26年中,直到他逝世前,共有107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其中就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不但没有被封锁住,反而走出国门,赢得了国际社会广泛的赞誉和支持。周恩来总理非凡的外交智慧,超群的外交艺术,幽默的语言魅力,杰出的精神风范,折服了世界舞台上无数的名人。早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一位美国资深的外交家说:“周恩来的风度太好了。”有30多年外交经验的英国人艾登也情不自禁地称赞:“我一生搞外交工作,还没有遇到一个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外交家。”周总理逝世后,联合国为他降半旗致哀,全世界向他致敬!

有人曾这样评价周恩来:“他不但能广交朋友,而且还能把敌手争取过来。”他正是这样的伟人!

1972年冬,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主动提出并亲自率领一个规模庞大的美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周恩来总理组成了相应规模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与之谈判,会谈一周时间,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了《上海公报》,为7年后中美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美国总统访问一个在意识形态上敌对了20多年,没有任何外交关系的国家,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罕见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此拍了一部新闻纪录电影,记载了世界史上罕见的事件。在这部新闻纪录影片中,有一个动人的场景令世人难忘:《上海公报》产生后,尼克松总统显得很愉快,准备启程回国,周总理起身送客,刚站起,尼克松总统拿起周总理的外大衣,谦恭而温情地给周总理披上大衣,中美双方人员都沉浸在愉快的气氛中。这一历史镜头令全世界瞩目和惊讶。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相互敌对仇视了23年,美国高空侦察机在中国领空不断骚扰侦察近600次,并且不断地向台湾蒋介石武装出售先进武器,每年在联合国大会上,都竭力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而我国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战争。

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强国,当时中国是世界上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联合国连个合法席位都没有,国际地位之悬殊,不言而喻。中美第一次会谈结束,这位世界霸主国的大总统尼克松,在周恩来总理面前放下了架子,如此谦恭友善的给一个敌对多年的穷国总理披上大衣,世界怎能不大为惊讶!

当时尼克松总统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活动,我们无法得知,但就这一外交寻常的举动和世界罕见的外交礼仪而言,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这一外交现象在世界几百年外交史中绝无仅有;二、周总理的人格魅力,完全折服了这位尼克松总统。

周总理如此强大的人格魅力是从何而来的呢?我的解答是:一具有渊博的学识和高深的修养;二具有坦诚的待人接物仪态;三具有超人的智慧反应;四具有儒雅的外交风度和风趣幽默的谈吐;五具有高超的谈判技巧;六具有非凡的处理复杂事务的能力。凡和周恩来接触过的外国人,没有不对他产生敬意的,尼克松也不例外。

尼克松在1974年辞职后,撰写的回忆录中这样评价周恩来总理:“在我会见过的世界上一百多位国家和政府首脑中,周恩来是最出类拔萃的。”这也许就是他当时为周总理披大衣的最好诠释。

综合周总理对国家、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对世界的影响,他不愧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伟人,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位卓越的战士,他是我们中华民族光辉历史上的一位圣杰。

不能忘却的好书记李仲英

金兆峰

在迎接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联系实际学党史悟思想的时候,淮安区不少年长的离退休干部,谈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淮安老县委书记李仲英同志,都很激动,有的人甚至噙着眼泪,说他是焦裕禄式的“心中只有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好干部,是老淮安人不能忘却的好书记。

李仲英同志1919年出生在淮安苏嘴乡的一个贫农家庭里,1941年5月投身革命队伍,同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生历经许多风险,吃过不少苦头。1943年的一天,他在博里西岗村召开群众大会,正在做报告时,因叛徒出卖,被“二皇”抓住,先被带到车桥,后随伪军部队步行押往淮安县城。当时他穿着便衣,老百姓装束,敌人尚未十分重视他。在押到石塘洞下时,天色晚了,乘敌人不备,他突然转头钻进了玉米地里,直奔顺河集方向跑去。跑到季桥乡一个庄子旁边,不敢进村,正巧路边有一户人家,他请该户的男主人帮忙带路。那人当即点头,把他一直送到顺河集上,尚未留下姓名,转脸就走了。解放后李仲英多次寻访此人,一直没有下落。他常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起他历经的危险,十分感慨地说:“当年没有老百姓掩护,我也许没命了。我们共产党革命成功,就是因为有广大群众做靠山。我们现在掌权当干部,就应该贴心贴意地为人民服务,给老百姓挡风遮雨谋福利。”

李仲英同志表里如一,说到做到。1954年苏北地区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大水,运河西部一片泽国。上级决定利用淮安运西地区分洪排涝。李仲英亲领工作组日夜奔忙,组织群众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灾后冬天群众缺吃少穿。一天大雪纷飞,李仲英带头踏着冰雪,背着粮食和寒衣,一一送到饥寒交迫的灾民家中。

1959年前后搞大跃进,不少地方刮起了一股浮夸风,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报刊上也时有“农业放卫星,亩产千斤棉、万斤粮”的报道。身在农村长大的李仲英根本不相信这些大话,他担忧的是浮夸虚报高产量,可能导致头脑发热高征购,让农民缺粮挨饿吃苦头。为此,他密切注视着淮安农业生产农民生活情况。1960年开春,他组织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和相关部门同志,分片下乡调查研究。四月份,他连续10多天在运西片、渠南片走田头,跑农户,了解实情。在范集公社姚桥大队看到粮食青黄不接,有人在吃野菜、啃树皮,他心头沉重,脸色铁青。在三堡公社陈庄大队看到几十个因饥饿浮肿被乡里集中供养的病人,他叮嘱乡里一定照顾好,确保他们每天一斤粮,每月一斤油、一斤糖。在施河公社调研时,他骑车到邻近的宝应县曹甸公社有关大队,踏麦田,看秧苗,询问当地生产生活情况,发现那里庄稼长势并不比淮安好,可地方干部还要放卫星、说大话,他皱起了眉头,很为反感。中午回到施河,他让随去的秘书周向明同志要通了县长赵荣洲的电话。赵县长当时正在淮阴地委参加夏粮征购预定计划会议。李仲英在电话中说:“最近,我跑了好几个公社,麦苗长势不好,夏粮产量不乐观,不能再搞高征购了。我们不要虚假的荣誉,一定要对群众负责。你在这次会上对夏粮征购任务不能轻易定案。”

6月份,李仲英带县农工部部长谷贯洲,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振营等同志,到渠北片,事先不打招呼,直接到田边场头,检查夏收夏种情况。在钦工公社前谷大队,看到有一垅千把亩田块,麦子收了,没耕没种,是什么原因呢?他站在田头沉思,担心是不是有人逃荒外出了,把地搁下了。他让人随即把钦工公社党委书记等人找到位,询情问责,叮嘱他们,夏粮产量不理想,秋种一定要寸土不让,抢种好山芋、大豆,争取秋粮好收成,尽最大努力以丰补歉,能装足群众的粮袋子。

8月份,李仲英了解到流均公社中桥大队搞水稻、茨菰种植,既有利于粮食增产,又有利于群众增收,还可以以茨菰做副食品,补充口粮不足,十分高兴。他带着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戴怀义,人委办公室副主任金殿元等同志,扎在中桥大队五天,调查座谈总结经验。

在大半年调查研究并经县委常委会认真讨论的基础上,李仲英同志亲自组织秘书班子,把淮安群众的生产生活、口粮缺口、补救措施等情况,汇总成一份详实的调查报告,报送淮阴地委。地委负责人看了报告,甚为吃惊。原预定要从淮安调走5000万公斤征购粮,可淮安报告中公然表明:以往每年淮安最多完成3000万公斤征购粮,而今年夏粮歉收,群众面临饥荒困境,无法完成5000万公斤粮食调拨任务。请求削减3000-4000万公斤征购任务。地委书记孙振华为此急忙赶到淮安,同李仲英同志争执不下,他甚至怀疑淮安报告的情况有假。李随即将各公社书记召集起来,向孙书记一一汇报,情况核实无讹。孙十分尴尬,但仍坚持说:“我无权削减淮安几千万公斤征购任务”。后在地委会议上,李仲英同志两次被作为右倾保守典型,被点名批评。9月份,孙振华同志亲自带李仲英上南京到省里“负荆请罪”。所幸的是省长惠裕宇同志接见他们详细了解情况之后,决定削减淮安2500万公斤征购任务,同时反拨1000万公斤豆饼应急救灾。淮安保住了一定的粮食,安然度过了饥荒年头。淮安周边的有些县却因浮夸风、高征购,饿死了不少人。宝应县委书记因此被撤职查办。

李仲英同志为了淮安人民,受了冤屈,吃了苦头,一度大会挨批,小会检查。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积郁成疾,得了精神分裂症,久治不愈。尽管后来予以平反纠错,地委有关负责人上门道歉,但晚了。1977年11月,李仲英在南京病逝火化,骨灰回淮安安葬,机关许多同志闻讯都自发地去迎接老书记魂回故里,在淮安县委小礼堂举行了追悼会。

李仲英同志是真正的人民公仆,像他这样求真务实、唯民至上的干部越多,人民群众越有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淮安地下交通站在抗战期间发挥的作用

董树华

1939年3月1日,日军攻占了淮城,淮安从此沦陷,日军以灭绝人性的暴行,给淮安人民带来了灾难。日伪军在淮扬公路及运河沿线,区乡主要集镇均筑有碉堡,派兵驻守,严格控制交通干线,并重重封锁。1939年6月,淮属中心县委和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不得不采取各种隐蔽方式,组织地下交通秘密联络。1940年初,重建淮安县委,淮安县交通机构的设立和地下交通站的成立,县区乡地下交通网迅即拉开,确保了战时各种秘密情报的及时传递,为反“扫荡”提供各种准备;秘密组织各类军需物资的运送和转运任务;护送刘少奇等党政军首长和重要人物安全过境。

一、设立交通机构,形成地下秘密交通网

1940年7月,八路军五纵队一、二、三支队,由鲁南挺进苏北,建立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成立淮海区党委,下设交通局随地委行动。3个中心县委分设交通分局,其中淮阴、淮安、涟水、泗阳四县为二分局。各县分别成立地下交通站,淮安县交通站配有交通员16人,各区设立交通分站和中心哨,乡设传递哨或乡邮,村设立哨岗(卡口),形成县区乡村四级地下秘密交通网。

1941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东南局和中共中原局合并成立华中局,设苏北行政委员会并建立盐阜地区行政公署,统一领导抗日。行署置交通部,各县设立交通科,并调整县治。将淮安运河堤西3个区改为盐北、盐南、林集、黄集、岔河5个区划入淮宝县;运河以东9个区仍为淮安县属盐阜区,后改为盐阜地委,淮宝、淮安县均设立交通科。

地下交通站的主要任务:一是保证各级党政军的指示、文件、报刊的秘密传递;二是掩护护送党政军领导干部及部队安全过境;三是筹集与组织各类军需重要物资的运送与转运任务。有的区还设政治班和武装班,政治班负责民主政权控制下的县区乡文件、报刊的传递,武装班则要穿越敌人封锁线传递公文或情报。为交通安全起见,县区乡都有秘密联络点,并规定联络暗号,白天发现敌人以鸣锣为号,夜间发现敌人以火为号。

淮安县地下交通站在条件极端困难与险恶,任务十分艰巨的情况下,完成了上级各项任务,为此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使之成为刺向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剑。

二、及时提供各类情报,积极配合反“扫荡”

日军占领淮安之初,多数日伪军龟缩在淮安城内,1941年开始向乡村扩展,首先控制通往乡镇的公路、大道,并以此向区乡村逐步延伸,筑便道,修据点,构筑碉堡,设置岗哨。并经常配备军车、汽艇船向四乡八镇进行扫荡,到处封锁道路、桥梁、航道、闸坝,盘查过往人员,烧拆民房、推倒寺院、抢劫财物、强奸民女、抓青壮丁。对此,区乡地下交通站和地下交通人员,在中共淮安县委、各区党委领导下,一面组织传递盐阜区委、淮安县委等各级党组织的指示、命令、文件等;一面收集日伪军各类军事情报,全面摸清日伪军据点位置、碉堡结构、岗哨数量、兵力部署、行动轨迹等;一面则退居敌后,发动群众,坚持进行反“扫荡”斗争,择机组织力量给以突然袭击,破路拆桥,以便牵制和及时准确有效打击敌人。

1939年,日军在水上用汽艇先后多次入侵泾口区流均、车桥一带,当地组织军民对乙卯堆(合兴村)先后切断桥梁3座;黄集区组织军民对邵葛、朱码一带挖路拆桥,阻扰和破坏日军兵源和军需品运输。1940年,日军占领马厂、丁澄一带,军民紧密配合,炸毁渔滨河上黄桥、浦马、席桥的桥梁,挖断淮安至涟水废黄河河堤多处,给日伪军以重创,缴获一批枪枝弹药和汽车1辆,俘虏日军10多名。1942年4月以后,为粉碎日军“春耕扫荡”阴谋,组织反“扫荡”,县成立破路委员会,顺河、钦工、茭陵、泾口、车桥、流均等区乡分别成立破路大队,在重点路段茭陵至苏嘴、车桥至流均拦路挖沟壕,阻断日寇交通联络,粉碎敌人扫荡阴谋。1943年10月,抗日总队在地下交通人员配合下,攻打日伪李家墩据点,战斗持续2天,共击毙日伪军60多人。1943年至1944年,日伪军在淮阴、淮安一带进行疯狂扫荡,并以巡逻艇在运河中往来游弋,到处抓扣民船、渔船和无辜船民、渔民,抢夺财物,淮安、淮宝县抗日军民在运河水岸边埋暗桩、筑暗坝、拉河网、设障碍,使敌人巡逻艇无法通行。

在斗争中,淮安县境内地下交通壕沟已与区乡村相连,迫使日军不得不收缩据点。当时日军控制下的集镇、乡村公路和南乡河网地区水上交通,几乎完全瘫痪,地下交通站为“反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秘密组织运送各类军需物资

1939年,苏北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部和第二支队水运第五团,为有力支援部队从水上展开抗日斗争,组织到一批满载弹药和军需品以及粮草等物资。他们组织400多艘民船分批从运河南下支援解放区,为了躲避日伪军沿途严格盘查,在淮安地下交通人员带领和掩护下,他们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物资埋藏在船舱甲板下面,或前后稍舱夹层里进行隐藏,有的将不怕水的物资摆放在船体水下,使敌人无法查找,终于将这批军需物资及时送达目的地。

同年,抗日军民在地下交通人员密切配合之下,县抗日民兵大队随身携带枪枝弹药和粮草需要从北乡徐码、桂码、马厂、小堆等4处渡口过河,由于没有民船,白天渡运容易暴露,军民们利用夜色月光,不声不响地沉入水下,用大小木桶作为渡河工具过河,躲避了敌人的盘查,有力支援北上展开抗日工作。

1941年,日伪控制下的淮安县城通往区乡主要公路、乡村要道,碉堡林立,岗哨密布。苏北解放区一些军需物品,特别是药品、布匹之类十分奇缺,要通过平桥、二堡一带敌占区几道封锁线,才能送达运西盐河北。在地下交通站的严密组织配合下,首先想方设法要将弄来的药品、筹集的粮食,存放在十分隐蔽的地方,确保不被敌人发现。其次要摸清沿途行走路线、岗哨位置、换岗时间,然后组织护送人员化装成“良民”、小贩,或将药品、粮食、布匹等分散掩藏在柴草垛中,或“病人”的手推车上、担子里,几经周折,分批陆续通过敌占区进入盐河北上。

四、护送刘少奇等党政军领导安全过境

1942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同志,奉调从新四军军部盐城途经淮安,秘密北上山东后去延安。中共淮安县委敌工部接到上级命令后,立即命令渠北沿途的区乡地下交通站,组织地下交通员,积极配合苏鲁交通队将刘少奇同志,从淮安北乡苏嘴与阜宁交界处的淮阜桥进入境内苏嘴、茭陵、顺河、钦工、马厂等地沿线,顺利通过了日伪军沿途封锁线,护送到淮阴与淮安交界处安全过境。淮安、淮宝县地下交通站经常秘密护送成批的高中级干部的内外境往来;成连成营的部队、抗日游击队护送过境;成包、成批次的若干重要文件、报刊、信件的递接送;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物资以及生活物资的筹集、分发、递送等任务;掩护保护了一批又一批伤病员和一些高中级首长家属安全转移到目的地。

护送党政军首长和重要人员过境,是地下交通站一项十分重要任务,淮安、淮宝县地下交通站和各区乡分站成立后的两三年时间内,曾先后护送过张云逸、曾山、张爱萍、陈丕显、粟裕、管文蔚、韦一平等党政军首长和重要人员,安全顺利通过了日伪军封锁县区乡道路交通干线和运河沿线。此外,对居住在淮安县城周恩来的婶母周八太,堂弟周恩硕、弟媳陶四姑和侄儿周尔萃等人,地下交通站人员及时转移他们居住地点,有时将他们转移到乡下,多次躲过日伪军上门搜查和盘查,使他们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和保护。

五、钦工地下交通站协助劝降刘氏兄弟

1939年初,两淮和涟水沦陷后,淮安北乡刘氏兄弟,老大名叫刘仰文,老二名叫刘秀文,均沦为土匪,收有徒弟1000多人,周围据点的伪军大多数是他们的徒弟,经常活动在盐河、废黄河两岸和淮涟一带,他们手下200多人盘踞在夹滩(处于盐河和废黄河之间,时属淮安一个区),是淮(安)至盐(城)的交通要道,对当地群众危害极大,直接威胁该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淮盐交通线的安全。

钦工位于淮阴、淮安、涟水交界的三角地带,是淮海区至盐阜区的必经通道。1940年10月,时任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赵心权为了斗争需要,在钦工附近的古驿乡颜景运家设立一个秘密交通站,在钦工交通站的基础上建立了交通联络站。1942年秋,上级派敌工部长廉纯一和联络站人员,一同开展争取刘氏两兄弟参加抗日统战工作,并通过古驿、和平两乡乡长及开明地主、士绅劝说引导,刘氏兄弟被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团结抗日主张真诚所感动,对过去危害人民行为有醒悟,对党和政府某些抗日要求能够给予同情和理解。1942年年底,达成4条协议:一是愿意率部投诚接受淮安县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民主政府承认其为抗日武装;二是为共产党和地下交通站提供军事情报;三是帮助掩护或护送我党干部和部队通过封锁线;四是为抗日民主政府购买或提供枪支弹药及医疗药品等军需物资。此后,刘氏兄弟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确实为抗日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43年年底,刘氏兄弟的武装分别被正式改编为淮淮、淮涟抗日游击大队,兄弟二人分别担任大队长。1945年10月,刘秀文率领200多人,编为淮安独立团的一个营,随新四军三师开赴东北。

六、林集地下交通站成为运西交通纽带

1942年年底,运河沿线的交通,主要是通过淮北军区敌工部淮宝县联络站、情报站(常驻林集区)。1943年年初,华中局交通科科长邓寅冬向李萍交待任务,传达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的指示,迅速派人回军部原驻地阜宁县获港取回组织部干部科埋藏在那里的文件。同时,对这条路线的交通工作情况做一次全面了解。李萍沿途在淮宝县林集区、淮安县的张桥区、五分区交通站、盐阜区交通总局等机关和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经过20多天的辗转,顺利完成了任务。

1943年2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交通科为保证从宝应到淮阴100多里运河线上的交通安全,决定在林集成立“华中局交通科驻淮北淮宝县(林集)转运站”,对外称“林集区交通站”,委派李萍任站长。林集交通站与苏中区张桥交通站(时属平桥),以及原有的林集联络站、淮宝情报站,组成一个秘密交通网,在宝应、淮安之间的运河两岸(尤其是西岸)的乡村开展活动。林集交通站成为运西中共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与华东的抗日根据地苏中(一师)、盐阜(三师)、淮南(二师)、淮北(四师)的交通纽带。林集交通站没有固定地点,主要活动在林码头屠大桥附近村庄。建站不久,淮宝县敌工部联络站王建高任副站长。主要任务:一是护送文件、信件、报纸;二是护送干部和部队渡过运河;三是配合地方武装惩除汉奸、特务。

日伪军为切断新四军一、三师与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以及二、四师的联系,派重兵驻扎在宝应至淮阴的运河沿线,设立大小据点21个,其中泾河、平桥两地设有日军指挥部,运河上有10多只汽艇昼夜巡逻。交通站为了保证这条地下交通线的畅通,针对敌人的封锁,一是利用来往盐行商人的关系,争取其配合;二是利用亲朋、友邻、熟人关系,以“良民”、小贩的身份出入敌伪据点,掌握敌情动态,书写标语、散发传单;三是利用敌伪营垒中的不同派系和相互矛盾予以分化瓦解。